

密 级： 无

论文字数： 3. 2 万

军事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侵华战略研究

研究生姓名：张婉英

年 级：94 级

指导教师：岳思平 副研究员

学科专业：军事历史



一九九七年六月

军事学硕士学位论文

日本侵华战略研究

张婉英

内 容 提 要

文章历史地考察了日本侵华战略的形成及实施,综合分析日本侵华战略的基本特点,并结合中日双方战略实施的成败,得出几点启示,以期唤醒人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警惕,并对未来反侵略战争战略的研究和探讨能够有所启迪。

主题词: 战略 法西斯主义 抗日战争

目 录

一、日本侵华战略的形成	(1)
(一) 大陆政策是日本制定侵华战略的理论依据	(1)
1、封建幕府时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理论逐渐形成	(1)
2、明治维新后，侵略扩张理论集中体现为大陆政策	(2)
3、侵略中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	(3)
(二)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侵华战略形成的精神支柱	(3)
1、武士道精神是武士阶级巩固其统治的精神工具	(3)
2、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仍保持着思想上的指导性地位	(4)
(三) 天皇制和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是日本侵华战略的组织基础	(5)
1、天皇制的确立加速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	(5)
2、军国主义与法西斯融为一体，国家机器嬗变为战争机器	(6)
(四) 帝国国防方针和对华作战计划的制订与修改，确立了全面侵华的战略蓝本	(7)
1、帝国国防方针的制订和第一次修改，中国被列为主要假想敌国	(7)
2、帝国国防方针第二次修改，拟制了全面侵华的战略蓝本	(8)
3、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强化了全面侵华的战略内容	(9)
二、日本侵华战略的实施	(9)
(一)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和扩大侵华的战略基地	(10)
1、侵占东北，迈出独占中国的第一步	(10)
2、制造“一·二八”事变，在华中建立全面侵华的	

桥头堡	(10)
3、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全面侵华的战略 基地	(11)
(二) 发动“七·七”事变，展开对华全面进攻	(12)
1、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实施对华全面 战略进攻	(13)
2、采取“长期持久战”战略方针，对中国正面战场实行 牵制性战役进攻，重点进攻敌后战场	(15)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力图迂回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16)
1、太平洋战争前期(1941. 12~1943. 2)，日本对华重新 采取攻势战略	(16)
2、太平洋战争后期(1943. 2~1945. 8)，日本对华转取 守势战略	(17)
三、日本侵华战略的特点	(21)
(一) 独占中国与征服亚洲、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 ...	(21)
(二)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速转为并不完全的“长期 持久战”战略方针	(22)
(三) 军事战略与政略、谋略相结合是日本惯用的伎俩	(23)
四、研究日本侵华战略的几点启示	(25)
(一) 从战争双方的综合国情出发，是制定本国战略方针的 重要前提	(25)
(二) 能否实施能动的战略指导，是决定战争双方战略成政 的关键因素	(26)
(三) 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制定和实施本国战略 的重要因素	(27)
注释	(29)
后记	(32)

日本侵华战略研究

日本军国主义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惨痛的创伤和巨大的冲击，成为中国人民难以抹去的记忆。但时至今日，日本仍有少数人歪曲事实，美化侵略，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涂改他们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页，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他们否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为其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华战争开脱罪责。

只有弹丸之地的岛国日本，究竟是怎样在侵华战略的指导下大规模地入侵中国，肆虐亚洲，甚至妄图称霸世界呢？深入分析和探讨日本侵华战略的形成、实施和基本特点，从中得以启示，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为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提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侵华战略的形成

（一）大陆政策是日本制定侵华战略的理论依据

所谓“大陆政策”，即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的，首先征服中国，进而经略东亚大陆，最终争霸世界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陆政策从日本封建幕府时期开始萌芽，至明治维新后基本形成，尔后逐步得以充实完备，成为日本制定侵华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和侵略指南。

1、封建幕府时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理论逐渐形成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的封建幕府时期。当时，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处心积虑，“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步骤，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大陆，均未得逞。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日本基本停留在津津乐道于封建社会军事思想体系的阶段。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日本闭锁的大门，其、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军事思想开始徐徐传入日本，并启示、推动了日本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在提出

以开国进取代替闭关自守政策的同时，“攻势国防论”和“南进、北进论”等对外扩张理论也相继出现，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初见端倪。1823年，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在其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中，明确地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第一目标，声称“在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易为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之满洲。”^[2]并描绘出最终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的侵略蓝图。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则使日本侵略理论更加具体和系统，强调日本应“急修武备”，然后“墨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控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3]

2、明治维新后，侵略扩张理论集中体现为大陆政策

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长期封建割据、闭关自守且极富尚武传统的日本，于1868年发动了一场深刻的改革维新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改革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它在给日本带来近代化的同时，也使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资源和市场急剧膨胀的需求。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步较晚，本国铁、煤、粮、棉等主要战略物资资源先天匮乏，加之本身所固有的极富侵略性的尚武传统，因此其对外扩张的迫切性较西方国家更甚。明治政府刚一建立，就在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中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4]并且完全继承了吉田松阴的理论衣钵，确定其侵略目标为：一是琉球，二是被其视为“渡满桥梁”的朝鲜，三是中国，并迅速用以指导侵略扩张实践：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翌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

日本初尝侵略扩张的甜头，更刺激了其开疆拓土的野心。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全会上作施政报告，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进，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最，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最，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邻近区域也。……铁线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最，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在对天皇的奏文中进一步指出：朝鲜“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运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成为枢新中国直达印度之途。”^[5]日本明目张胆地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并且列为帝国议会的主要议题和政府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表明日本已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立为基本国策。“二线论”集中体现了日本的对外扩张总方针，标志着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此后，日本便以此为依据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侵略扩张，并逐渐使大陆政策成为更加具体、更加完备的侵略指南。毛泽东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6]

3、侵略中国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

在大陆政策形成之初，日本侵略矛头虽然也指向朝鲜，但是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只不过是找块跳板，然后以“窥清国”，中国才是日本能觊已久的侵略目标。1874年侵犯台湾后，日本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因而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1894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中日战争，从中国攫取白银2.3亿两，霸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又迫清政府交付“庚子赔款”，获白银3479万两。巨额战争赔款滋养了日本，使其资本主义工业化基本确立，军备得到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大增。藉此，日本于1905年出人意料地打败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陆上强国俄国，从其手中夺取了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并将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军国主义就像滚雪球一样，势力越滚越大，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并跻身世界军事大国之列。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此为契机，将其大陆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膨胀阶段，也使它对中国的侵略迅速渗透到内地。它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整个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翌年1月，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苛毒的“二十一条”，企图使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的附属国。这表明，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由占领朝鲜和参与列强侵华，进犯中国辽东等东亚边沿半岛，发展到谋求独占中国，迅速进入亚洲大陆的新阶段。正如日本进步学者井上清、铃木正四所言：“像过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7]

（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侵华战略形成的精神支柱

1、武士道精神是武士阶级巩固其统治的精神工具

日本武士通起源于12世纪本的封建幕府时期。1192年，在长期割据混战中产生的专事杀伐征战的武士阶级，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他们权力擅行其“武家习气”、“弓矢之进”，依之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

的思想文化。后经江户时代吸收中国儒家与佛家思想，形成了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在武士统治日本的约800年里，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加以宣场，武士道精神深印在许多日本人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

日本武士道在吸取中国儒教和佛教之初，倡导和发展了得主尽忠、交支守信的封建伦理。然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吸收儒教和佛教的真谛，而是对之进行了扭曲。美国学者克里瑞认为：“武士道在精神和实用上都跟儒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户的佛教里掩饰了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可见，儒教与佛教不过是被拉来用以粉饰武士道内核中好战、残忍、嗜杀的幌子。

2、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仍保持着思想上的指导性地位

明治维新虽然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武士道精神因契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而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仍在日本社会伦理文化中占据指导性地位，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工具。

明治维新后，神道教被确立为日本国教。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多神教。主张人不分野坏死后均可成神。因此，武士道融入了神道教后，试图寻求一种在文墨书香与血腥杀戮之间的心理平衡，导致其信徒在人格上的权端双重性，如：讲究仁义忠孝而又嗜杀成性；恪守举止儒雅而又野蛮凶残；自狂自傲而又自卑自薄；不择手段致压弱者而又顶礼腥拜顺从强者。这种思维模式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及法西斯军国主义相结合，就把反人道和非人性推向极端，铸就其疯狂的侵略性、残酷性和野蛮性，其表现就是好战、虐杀和轻生，直至剖腹自杀和逼道伤兵自尽。由此现们也就可以明晰，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那样残忍，甚至灭绝人性。

由于武士道精神道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致策的需要，因而被大肆宣扬，百般美化，强加给广大士兵和民众。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发《军人谕旨》，强调从神武天皇以来的日卑军队，“世世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朕肱，汝等饰腥为首脑”，要求军人遵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8]军国主义者甚至还用根棒、皮鞭、剑道、柔道等训练方法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利用武士道精神，蒙蔽愚化日本士兵与民众，使他们道步变成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实施侵华战略的工具。

（三）天皇制和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奠定了日本侵华战略的组织基础

1、天皇制的确立加速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形成

从7世纪后半期日本国家最高君主自称“天皇”以来，统治阶级就制造了这样一种信仰：天皇是天上诸神世界中的最高君主——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世间的神。因此天皇是神的权威和最高权力的统一。封建幕府时期，武士阶级执政，天皇失去了权力。但是其神的权威却得以延续。明治维新建立起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重又实现了天皇的权威与权力的统一。“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天子”的神话被政府大力宣扬教化，渗透到国民之中，使国民对“天子”的宗教性崇敬，逐渐演化为一种富有政治色彩的对天皇陛下的忠诚。他们利用这种权威“统合”人民，维持和强化政权本身。

为尽快建立和发展政权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明治维新之初，政府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等一系列维新政策，以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但不久“富国强兵”即畸变为“强兵富国”。1872年，明治政府发布《全民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担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9]“二线论”提出者山县有朋极力主张“练兵”乃“富国之本”，“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半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故“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才是“燃眉之急”。^[10]从而快步走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为了“强兵”，日本对国家政权机构、军队统帅与但织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大力调整与改组，建立了天皇制军队。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政组为参谋部，直属子天皇，掌管作战、用兵等军令大权，与掌管军政大权的隶属于政府的陆军省分立，初步建立了军令与军政分立的军事二元制；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军队统帅权，军令长官拥有“性幄上奏权”，可以不经内閣直接上奏天皇；1893年海军也建立了军令部，从而最终完成了军事二元制；同年还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均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文官被排除在大本管之外；1900年山县有朋内閣又规定，陆海军大臣也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实行“现役武官专任制”，从而使军部可以逐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或辞职而不提名继任人的办法来左右内閣的存废。

天皇制军队的建立，使军权被推到了国家政权中的至高位置，内阁实质上被架空。从法律上讲，日本陆海军武装力量直属于天皇，军部只对天皇负责，政府无权过问军事。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特权地位的确立，造成了日本近代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加速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律制的形成。

2、军国主义与法西斯融为一体，国家机器变为战争机器

在对内独裁和对外战争方面，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是一对双胞胎。但二者在体制上有所区别，前者是在但特国家政体及其政党内阁的情况下，被附于各种政治形态的；而后者则彻底打破了军人不干预政治的束缚，全面地介入政治，成为垄断资本财团与反动极权政治相结合的产物。

日本从军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直至二者融为一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战结束后，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首的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叫嚣中相继兴起。与此相呼应，日本法西斯的界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1920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其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政。随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纷纷亮相。

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之所以在日本得以迅速繁衍生长，是因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给了它适宜的生长环境。以1918年的“米骚动”为开端，日本进入危机四伏的对期；1920年至1921年，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23年东京发生7.9级大地震；1927年遭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日本，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新冲击。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政治形势的恶化，工农斗争不断加剧，武装暴动时有发生，一些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纷纷建立。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日本统治者决心以恐怖政治来维护其统治，用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日本法西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并畸形蔓延的。

在日本法西斯化的近程中，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骨干力量，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923年，永田铁山等一批青年军官，成立了日军第一个法西斯组织——“二叶会”。此后，“天剑党”、“樱会”、“王师会”、“木曜会”等一批法西斯组织相继出笼，其中尤以1929年5月成立的“一夕会”影响最大。“一夕会”奉行上层路线，通过和平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部、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

的实权职位。其主要成员东条英权、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军人法西斯势力的政治目标是，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争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为达成上述目标，他们掀起了新的对华战争叫嚣。东条英权在1928年声称要以“满蒙问题为主要着眼点”。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11]

随着法西斯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法西斯军人势力开始向“政党政治”发起冲击。1931年，相鼓发动了三月、十月政变，1932年又暗杀了首相犬养毅，从而始末了政党内阁，开始向军人内阁过渡。随后，西绕建立法西斯政权的途径问题，法西斯军人势力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渡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发，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皇通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军部内两派之间斗争愈演愈烈，矛盾不断激化，流血事件接建发生，终于在1936年2月26日由皇通派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重大转折点。它始末了日本内阁中军人和政党分权的“二重政府”格局，确立了军人内阁体制。至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成为推动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的加速器。

（四）帝国国防方针和对华作战计划的制订与修改，确立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略蓝本

1、争国国防方针的制订和第一次修改，中国被列为主要假想敌国

1907年，日本以天皇御批的形文，颁布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以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规定“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从而决定了其对外战争战略的进攻性与侵略性；第二，强调“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第三，确定主要假想破国“当以依国为首，次为美、德、法等诸国”。

1911年，由于国际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专门拟订了对华作战

计划。这一作战计划规定日军作战方向为“在确实占领南满洲之同时，攻占北京，并占领浙江、福建”。至于实施进攻作战的时机，则以“行使武力的动机、中国内情及第三国态度而定”。^[12]

1918年6月，日本对“国防方针”等文件进行第一攻修改。将主要假想敌国的排列顺序改为俄、美、中，中国作为日本假想敌国的位置显著提前。在用兵纲领等文件的补充规定中，还确定了对华作战兵力。此外，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以承受，故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从字面上看，中国是排在俄美之后的第三值敌手，但这个排列并非日本确定的作战对手次序，而是指其军事实力对日本可能构成的威胁。中国始终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首要目标，只不过中国兵力弱小，不堪一击，对日构不成威胁，美、俄才是日本争霸世界的最后对手。故日本提出“看国对我在满洲及韩国之特权有极大之利害关系”，“但著对我单独首开战端，我将以必胜之算对抗之”。不论对俄还是对美作战要领，均可见“陆军以满洲为主要战场”、“将主要战场引向满洲”的条款。因此，不论日本对美还是对俄作战，都是以征服中国为前提的。

2、争国国防方针第二次修改，拟制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略蓝本

1923年，日本对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攻修改，制订了更为详尽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日军准备从北向南多方向发动进攻，其主要攻击点有三：东北地区，应加以全面控制，其中北满地区还应兼顾对苏作战任务；华北地区，必要对实施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登陆作战，占领河北、山东等要地；华东地区，选定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为登陆点，作战范围视情况而定；其余在浙、粤等东南、华南方向的作战亦视情况而定。

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二次修改，建构了日本对华战争战略的基本框架，成为日后历年对华作战计划的蓝本，日本的侵华战争正是以此为基本走向的。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计划性、全面性。

1925年，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北伐即将开始。针对这些情况，日本制定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将中国上升到首要假想敌国的位置。在兵力部署上亦将重心置于中国，计划动员兵力32个师，其中用于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充队，对苏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则多这16个师。其中对苏作战的绝大部分兵力还将以中国东北为作战基地，因而侵华实际兵力远远超过这个计划。

该计划还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三大战场的兵力部署。东北方向：作战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洲一部，使用兵力为5个师；华北方向：准备以足够兵力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使用兵力为7个师；华东方向：要在上海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点，在此方向的作战及其实施应依具体情况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该计划中还明确指出要攻占中国心脏地区的汉口，以在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

3、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强化了全面侵华的战略内容

日本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确立后，为进一步加快侵华战争步伐，于1936年6月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以便对全面侵华战争发挥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要“整备武备”，以武力为对外政策之根本，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规定了国家武装力量的发展规模：日本武装力量应扩充到陆军50个师，空军142个中队，海军各种规船218艘，海军航空兵65队。^[13]

其次，强调重视长期持久战争问题。指出“未了的战争大有长斯继续之虞，必须作好承受这一状况的认识与准备。”这在日军战略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的提出，显然与即将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有密切关系。

第三，重新规定了关于战争对手的顺序问题。强调了美国和苏联从国力上看，是最具威胁的首要战争对手。但是，无论是对美、对苏作战，都必须首先以中国国土作为作战基地。显而易见，中国才是日本首要的战争对手，占领中国是日本对外战争的基本前提。

大陆政策决定了日本必然走上侵华战争的道路，而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和武士道精神的指导性作用，则使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发显成一部对外侵略的战争机器。随着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及军队用兵纲领的不断修订，日本侵华战略也一步步完备成熟起来。

二、日本侵华战略的实施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制定独吞“满蒙”的政策和计划。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整理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根根本政策》（即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上奏天皇。这份奏折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会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发、南

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我对满蒙权利知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14]道出了先夺“满蒙”，再取全中国，进而征服亚洲，最终争霸世界的侵略步骤，其对外扩张之野心昭然若揭。

东方会议犹如一次日本侵华的战争动员会，《田中奏折》则使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更具体、更完备、更具操作性的新阶段。正如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所言：“后来东亚发生的势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的步骤进行的”。^[15]东方全议后，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对华进行军事挑衅，尔后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并紧锣密鼓地制订了一系列对东北的作战方案。日本侵华战争之势已如箭在弦。

（一）“九·一八”事变后，建立和扩大侵华的战略基地

1、侵占东北，迈出独占中国的第一步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柳条湖爆炸事件，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从此，战火从中国东北开始向全中国蔓延。

日军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进次，采取中心（沈阳）开花，分进南北的策略。由于蒋分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对日军的进攻作出“强力反弹”，使得日军知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仅用4个多月时间，即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迫不及待地以“满洲国”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异请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一个“独立国”，日本还自导自演了一出承认“满洲国”的丑剧。9月15日，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至此，中国东北已完全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日军以微小的代价便掠得大量的战略资源，并为其日后叩关扩大战争占领了一块进可次、退可守，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3倍的理想战略基地。

2、制造“一·二八”事变，在华中建立全面侵华的桥头堡

日本在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之际，即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再燃战火。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门户，并且处在日本、冲绳、台湾这一弧形岛链的焦点位置。因此，上海不但对日本占领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地位，而且对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来说，也是一个志在必得的重要战略据点。然而在日本历年作战计划中，上海一直列在本北、华北之后，计划中的作战用兵比例也低于东北、华北。其主要原因为进攻上海势必与英、美等国在上海的权益相冲突。

日军之所以在1932年初进攻上海，我们从当时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口中即可得知其中玄机：1931年11月日本在东北的作战行动大体完成后，为了使满洲独立体制加快形成，关东军作战参谋板垣征四郎致电首相田中义一：“外国的目光很讨厌，须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16]此外，进攻位于华中沿海地区的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窥视南京，也是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进其在东北和华北方面让步的重要一着。

日军在上海的军事行动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经40天苦战，三度增兵，屡遭挫败。虽然最后迫使中国守军撤出第一进防线，但要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已十分困难。日军迫于列强的压力，更主要的是转移各国注意力，掩护“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对上海作战实施了停战指导。5月5日，中日两国正式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藉此，日军取得了在上海驻兵的特权，在华中建立了全面侵华的桥头堡。

3、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扩大全面侵华的战略基地

东北被占领后，华北便成了日军的战略重点。随着“满洲国”扶植成功，日军随即挥师南下，其兵锋直指关内，力图拓展边界，压逼长城，经略华北。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由东北开始入侵华北。其战略意图有二：一是征服热河，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的东北军张学良势力，巩固“满洲国”。早在1931年，板垣征四郎即在《从军事上看满蒙》中将热河划入“满洲国”界内，并指出它既是满蒙地区的屏障，又是跃击中原的跳板；二是攻占长城，确保对于长城重要关口的控制，调整对华北方面的战备，恢复省内“治安”。其中，后者为重点。日军始终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17]所以，日军入关，乃是其占领东北之后扩大战争规模的必然趋势，是逼循英侵华战略遭渐南侵的重要步骤。

日军打通山海关后，于1933年2月17日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热河。仅用两周时间，即占领热河全境。然后乘胜向长城各口推进，相继攻占古北口、冷口、喜峰口及南天门等长城要塞，并于4月下旬跨过长城进入河北的滦东地区，打破了国民党政府以长城作为华北地区防线的计划，迫其签定城下之盟——《塘沽停战协定》，划出了所谓非武装区的缓冲地带。随后，日军通过“各后会谈”，迫使中方同意其提出的《关于华北善后交涉议定案》，提出长城各口由日军负责警备，“满洲国”得在长城各关隘设立必要的机关等要求。这一议定案虽谓为停战协定之各后，其内容却超过军事协定范围而成为政治性要求。正如冈村宁次所言，《塘沽停战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向大东亚战争，及我之长期对外战争中之最重要的联结点”。^[18]

鉴于华北是列强关注的焦点，加之关东军在“满洲国”及中苏边界设置了众多兵力，日军对华北采取了有别于东北的特殊政置：“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逐出华北；2、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3、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19]其目的在于使华北“脱离南京的羁绊，由中国方面人士成立自治政权，导致日、满、华北的彻底亲善”。^[20]也就是所谓的“华北自治”工作。

为了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以扶植傀儡政权等政治手段辅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进中国就范。日军通过制造“河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与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前者延伸了《塘沽协定》所规定的中国撤军线，在察哈尔省设定了中国撤军区，并在该省范围内给予日本比在河北还要广泛的活动余地；后者突破了《塘沽协定》的范围，使日本的干预扩及整个河北省。1935年11月25日，又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傀儡政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迫谈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平津及冀察地区，作为通应其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的“华北自治机构”。从而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冀察两省的统治力量。日本在华北纵推捧国，文武兼施，但是其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由鲸吞东北到蚕食华北，染指华中，侵华战争逐步升级、扩大，建立了全面侵华的战略基地。这不仅仅是中日两国间局部地区的一般军事冲突，而是日本实施侵华战略，企图独占中国的第一步。

（二）发动“七·七”事变，展开对华全面进攻